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往事非烟】	我在“一打三反”的风雨中 ——一个文革中的大学生“思想犯”的自述（二）	忻鼎亮
【不堪回首】	致聚会同学——回忆“一打三反”	孙进和
【难忘岁月】	告别未名湖的日子	郭娜嘉
【史海钩沉】	公社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 ——回忆北师大文革中的一段群众辩论的公案	安希孟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往事非烟】

我在“一打三反”的风雨中
——一个文革中的大学生“思想犯”的自述（二）

· 忻鼎亮 ·

（上接 zk1502c）

三，一打三反运动

1，山雨欲来

科大迁校到安徽后，“一打三反”运动接踵而来，我一生中最恐怖的日子即将来临了。科大到安徽开始落在安庆党校，那里的条件实在太简陋，于是又迁到了合肥。安徽省革委会将合肥师范学院的地址让给了科大，总算有了房子能够勉强安置这群落魄的师生以及一些拆散了的仪器器材。我随大部队到了安庆后，没有再跟随去合肥，便坐船回上海过年去了。

在上海，我已听说有中央文件下发，要在全国开展“一打三反”运动。这场运动，重点在于“一打”，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主要惩治文革中出现的现行问题。过完年不久，我们班就有同学来信告我，要我尽快回学校参加运动。我当时的心情比较复杂，这次运动来势很凶，从清查内容看明显是要整肃文革运动中的政治异己分子，我们恰好就是目标，内心自然有本能的紧张感。但我的侥幸心还是比较重，心想：刚经历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已经被清查了一遍，而且有了明确的结论，应该不会出问题。更何况安徽这样的土地方，工军宣队的整人水平会比北京的高？我们根据北京的成功经验，如法炮制不就可以了吗？不必过度紧张，这样反而会显得心虚。于是，我故意晚了几天到学校，而且到了合肥后，我还在大哥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才去报到。那时，同学们大多数都已返校，大家见面后几乎都是谨言慎行，没有嬉笑闲谈的场面，气氛比我想象的要紧张。我们班的临时班长何世平带我去见系里的工军宣队领导报到，系工宣

队队长姓谢，是淮南煤矿的一个造反派头头。他见了我立即摆出下马威，厉声厉色地问我为什么迟到？我随便找了一个理由，他勃然大怒：难道这事比“一打三反”运动重要吗？随即又给了我一个明显的威胁：不要以为我们不了解你忻鼎亮。我心里明白，工军宣队已经盯上我们了，但我对谢队长这种虚张声势的诈唬很鄙视，再一次地错误估计了他们的整人能力。

安徽省既然接纳了中国科技大学，显然非常重视这所学校，当然首要的任务是要它服从。“一打三反”运动正是个好机会，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来压服这批桀骜不驯的学生，这是最有效的方法。所以，科大的学生们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受到的迫害，更甚于其他大专院校。安徽省革委会派出了阵容强大的工军宣队，来领导用以制服这批带着怨气来的京城师生。工宣队队长是安徽省革委会常委李东林，原来也是淮南煤矿工人，造反起家，荣升至省革会常委。军宣队来自李德生的嫡系部队十二军，有几个师政委压阵。他们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将在搬迁时闹得最厉害的四系（近代物理系）安置在白湖农场（一个劳改农场），一系（数学系）在铜陵，二系（物理系）在寿县，三系（化学系）在马鞍山，五系（近代力学系）在合肥本部，六系（无线电系）在淮南。各个系分别搞运动，学校办了一个大型的学习班（在合肥），将当时的两派的核心人物集中起来开展运动。我们由于后期游离在运动外，也没资格进入校学习班，在合肥系里参加运动。通过学习，才知道这是中共中央在1月底下发的1970年3号文件，其中突出的就是要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文件中这样说：“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对那些通敌叛国、阴谋暴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攻倒算、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和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我觉得其中仅“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条有很大的随意性，其他都应有实际行为。但来势汹汹的气氛明显比文件本身更为可怕。

2，攻守同盟

许小昆到校比我还晚，有点奇怪，工军宣队并没有训斥他，淡淡地把他晾在一边。我开始的处境也与许小昆相近，除了刚到校的那次下马威，他们再也没理过我。工军宣队在运动开始时并不急于揪人，一方面组织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另一方面要大家联系实际，批判反对搬迁的思想和言行。因为我校的搬迁，是完全违背广大师生意愿的官方强行决定，所以校内两派师生几乎一致反对。现在工军宣队上纲上线，要大家强行认识：迁校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命令，反对迁校就是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这说明反动思想的萌芽已经存在自己的头脑中。这一招确实相当厉害，每个人都有了“原罪”，谁不转变立场，立即和工军宣队保持一致，谁就是继续与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抗，就要成为运动中惩治的对象。在这样的高压下，大多数师生除了就范，无可选择。同时，工军宣队还开展了一个“检查思想，公物还家”的小运动。背景是这样的：在北京时，当大家知道迁校决定无可更改时，同学们非常愤怒，毁坏了一些公物泄愤。也有些人拆了桌椅，用木板作箱子、板凳，更普遍的是用木板自制收音机盒子。这件事也被工军宣队小题大做，说这是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思想大爆发，而且要大家把用公家材料做的物品归还，并检查交代用短波收音机收听敌台的“罪行”，上纲说这就是现行问题。这样，人人都有可能被定为“反革命”，为了自我保护，大家只能对工军宣队唯命是从，不敢有任何抗拒。在强大的思想震慑下，群众已彻底表示了屈服，工军宣队初获全胜，整人的大戏正式开场了。

校学习班重点整肃的是原科大造反派《东方红公社》的一些核心骨干分子，详细情况无从得知。我们系整肃的重点有两个：一是原东方红公社的作战部长陶荣甲，他和北京市的一些造反派（多数已遭整肃）多有联系；另一个就是我们《齐卫东》战斗队，被工军宣队盯上的除了我和许小昆外，还有徐立林、焦大化、钱德生等人。我系运动领导者除了谢队长之外，还有军宣队的潘指导员和一位姓贺的结合干部（据说还是个十二级高干）。整人者经验丰富，手法老到，有条不紊地先打外围战。当时，我们“齐卫东”中受到压力最大的是徐立林，他被抓住的一个硬把柄并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与一位干部子弟徐XX谈恋爱时有越轨行为。工军宣队对此无限上

纲，并对那位女同学做分化工作，告诫她不要受反革命分子迷惑，而背叛自己的革命家庭。对徐立林则严令他老实交待问题，不准私自串联，并对他的行动作了监视。而对许小昆和我则不动声色，没有任何异常的迹象。我有些迷茫，猜不透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也不敢与同伙们串联商量对策，只能被动地静观其变。我们班有些与我关系较好的同学劝我应该争取主动，把以前运动中的问题主动向工军宣队交待清楚，当然他们并不知道我内心还有很多“反动”思想。我自然不会接受他们的劝告，自己找上门去岂不是更显得心虚？

在一个休息日的晚上，我、许小昆、徐立林冒险在校园僻静处商量了一次对策。许小昆重新强调了我们的应付工军宣队的原则：文革运动中的具体事件一概承认，但拒绝上纲，私下言论的事坚持守住。并再三提醒，态度一定要好，要安分，不要刺激工军宣队中任何人。徐立林就问了一下焦大化、钱德生处是否叮嘱过，为了避免被发现，他先回宿舍了。许小昆和我又谈了几个关键问题：第一，这次运动来势凶猛，声势远胜过清队运动，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这一点我表示赞同，但内心的侥幸心理仍未消。第二，我们能否躲过这场灾难的关键是我们的言论问题不被败露。我觉得这点应该靠得住，因为尖端的观点和言论仅限在我和许小昆之间，徐立林虽有些所闻，但知道不多。我确实忽视了平时口锋不严，大不敬的言论已有一定范围的流传。第三，许认为，徐立林那里最危险，他的女友就是工军宣队的突破口，应考虑如果小徐被攻破后怎么办。我觉得小徐很讲义气，他会顶住的，即便有意外，只要我们俩死扛住也未必会有大难。最后，我们两人互相勉励了一下，觉得为了理想哪怕坐二十年牢也值，似乎大有义无反顾的气概。现在经过四十多年后再回想当时情景，我们真是严重“走火入魔”：两个毫无政治背景的小青年，为了一些尚欠成熟的思考，居然能到不顾身家性命的地步！其实，我们的所谓理想太虚弱了，与强大的整人机构过了几招，就遭到了惨败。

运动开展将近一月，我们的厄运正式来临了。起因是这样的：我们的一位好朋友梁 XX 是已毕业的 63 级学生，他出差路过合肥，来看望我们，我和徐立林一起接待他。这触怒了工军宣队，谢队长质问我：为什么违反规定，私自和徐立林串联？我表示不知道有这样的规定（不准和徐接触），更何况是外地有朋友来看望我们。他闻言怒斥：你居然态度如此不端正！并当即决定：今晚开忻鼎亮的批判会。我心里已经早准备好有这一天，也想正好趁机摸一下他们的底牌。第一次批判会他们未见成功，批判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过去炒过的冷饭，积极发言的多数是对立派的同学，我平时关系好的同学多以沉默表示对我的同情。我心想他们的招数只不过如此，则仍以无所谓的态度作进一步的面对。但工军宣队丝毫没有放松，一方面宣布我是批判对象，让一个同学每天寸步不离地监管我，再不让我与其他人在有联系机会。另一方面加紧了对徐立林和他的女友施压工作，我已无法了解任何相关信息，只能从观察周围同学对我的态度来判断形势的变化。两天后，我隐隐觉得情况有些恶化。有些同学竟会对我怒目而视，一些关系较好的同学路遇时也会有意转过脸去，为什么会这样？事态趋于严重是肯定的，但严重的程度我实在无法得知，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工军宣队上有中央文件，下有各种手段掌握控制了群众，且拥有经验丰富专业整人机构，信息畅通，知己知彼，完全是压倒优势。而我仅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只能接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现实。

3，屈辱投降

在第二次批判会时，工军宣队已经完全成竹在胸了。开始发言的几乎都是平时的好朋友，揭发的多数都是我私下“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言论，使我即刻崩溃的事是：有人揭发我们是个“叛国投敌反革命”小集团。这是文件中明确列在首位的罪状，如果坐实，定是敌我矛盾无疑。事情是这样的：大约在 69 年初某一天，我们一些好朋友在许小昆家吃饭，那时，我们的思想已对文革非常厌恶，对现实也甚为不满。在席间，我趁着酒兴，说到我们未来前途暗淡，如果有机会，能逃到苏联等国，倒还有我们的用武之地。大家也都附和，还说到在内蒙或沿海一带都有机会。其实，这仅仅是当时的一种发泄，大家也只是说说而已，事过之后，我几乎忘

了这个茬。在批判会上，我的一位参加这次“黑会”的朋友揭发了这一场景，我才突然想起确有其事，顿时如遭霹雳，思维完全失控。工宣队已清楚地看到了这一招的致命效果，冷冷地插话：“你别想狡辩抵赖，至少已有两个以上的人证明了你的这一罪行。”顿时会场沸腾，“打倒叛国投敌份子忻鼎亮！”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声音中确实带有许多愤怒的情感。我心中感到战栗，我明白，有不少同学觉得我欺骗了他们，居然内心隐藏着如此反动的思想。在当时，对文革的不满，对一些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的不满比较普遍。但对整个国家制度不满，对毛主席不满，绝大多数人是不能接受的。我们的思想已超越了群众认同性的底线，同学们不明白我们这样的想法究竟为了什么，因此失去了平时的信任，甚至怀疑我们真的有罪恶企图。如果说第一次批判会同学们多数屈从于压力，而这次却真心地站到了工军宣队一边。我确实崩溃了，第一次感到被社会抛弃是什么样的滋味。工宣队胜券在握，像猫耍弄老鼠一样找我谈话，问我对这次批判会的感受。我完全像一只斗败的公鸡，低着头，什么也说不出来。谢队长准确地掌握了时机，用嘲弄的口气问：“你自己说你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我已没有任何申辩的力量，继续无语。他软硬兼施：“你问题这么严重，我们还是想挽救你，关键是你自己要端正态度。”我以往的“豪气”全消，连连求饶：“我一定老实交待。”他毫不放松：“态度老实要有具体表现，我们只是点你一个问题，你们的问题还远不止这些吧？”进而威胁：“最好你自己说，要不然再开次批判会帮助你？”我脑子顿时一片乱麻，鬼使神差地竟说出了：“我反对毛主席……”“嘿，嘿，……”谢队长发出瘆人的阴笑：“这就对了，回去好好写交待，把事情说清楚，我们才能考虑给你出路。”我屈辱地投降了，这令人终身羞愧的一幕永远留在脑海中始终磨灭不去，从此，我完全掉入了工军宣队布置好的陷阱中，再也没有抗争的余地了。自那时起，我的宿舍被调整，定名为“忻鼎亮学习班”的小组即刻成立，与我同房的都是小组成员，为了加强对我的监管并防止出现意外。

那晚，我几乎整夜失眠。在“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它的狗头”的年代，我人生的前景一片黑暗，会受到怎样的惩罚无法预测，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工军宣队的意志，老实交待自己的“罪行”。第二天，我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写了四十几张纸的交待，把自己怎样开始怀疑毛主席及后来思想的发展，详细地交待了一遍，以表示是自己的“投降”态度。结果，效果相反，谢队长怒气冲冲地把这一叠纸扔在我面前，声称：“全是废纸。”我一时懵住了。后经学习班一位好心同学提醒，我才明白书写交待的格式，必须要一件事一写，写明时间、地点、在场人、谈话内容和行为。我这才明白，工军宣队根本不是要挽救我，给我出路，而是要把我这“反革命”言行坐实，以便定案。但我无法反抗，只能按照其要求回忆、交待。由于我们都是随便的私下谈论，时间地点大多数已记不清，所以也永远无法得到他们“态度老实”认可。我自己的情况已经无所谓了，“叛国投敌”、“反毛主席”都认了，还有什么不能承认的，关键是我尽量想办法把我“投降”的事告诉许小昆。工军宣队同样关注到这一点，他们胁迫我，要我在公开场合下揭发许小昆，一方面可以给与“小集团”的一号人物心理上致命打击，另一方面能使我和许之间产生矛盾和不信任，以利于进一步的互相揭发。这是他们彻底打垮我们的最后一步，校军宣队领导曲政委不惜放下身段亲自找我谈话，警告我，如果不公开揭发许小昆，则说明以前的“认罪”态度都是假的。我表示：揭发可以，但希望能在此前先见许小昆一面。这种“与虎谋皮”的妄想遭到了曲政委无情的嘲讽：“你认为现在还有资格和我们讲条件吗？给你立功的机会都不想要，你问题的性质自己清楚，别等进了监狱再说后悔。”高压下，我再次屈服，在批判许小昆的全系大会上，我站起来揭发了许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我们“小集团”的同伙在大会上接二连三的揭发，工军宣队顺利攻克了《齐卫东》最后一个堡垒。仅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便兵败如山倒，《齐卫东》小集团每个成员都有一个学习班，每班都配有六、七个同学或老师监管，完全失去自由。每天不是开批判会，就是写交待。五系工军宣队成果辉煌，揪出了“齐卫东叛国投敌反革命小集团”。系里成立了大专案组，由姓贺的那位老干部负责，汇总我们每天上交的交待和揭发材料。

4，追查后台

事态发展日趋严重，专案组汇总材料时感到有些震惊，我们“反动思想”的深度超出了一般大学生的认识境界。他们认为，这不可能是几个二十几岁毫无社会经验的学生自己悟出来的想法，后面一定有“长胡子”成年人指点和煽惑，于是，他们集中调查我们的各种社会关系。我们究竟交待了那些“反动思想”使工军宣队起疑，我现在已无法详细回忆，更何况我们的交待材料在平反后已全部销毁，只能靠记忆中仅留的点滴简述。我交待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有两条记忆比较深：一件事是我和许小昆在讨论《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这篇文章时，正值中共九大召开后不久。我们拿这篇文章与林彪九大政治报告作比较，（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张春桥的大作）说林的报告是完全违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因为马克思把社会发展的原因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关系的改变，从而推动了社会进步，而林的报告丝毫没有突出这一点，而是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因。我们进一步批评了毛泽东的著名语录：“……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用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叫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是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相反的。于是我们用马克思的观点逐段批判了九大报告。另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和徐立林在许小昆家一起讨论恩格斯的《家庭国家私有制的起源》。许小昆在谈到国家这一概念时，强调了恩格斯突出的国家阶级调和的功能，并批评在文革中“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这一说法。我们认为毛泽东在这里偷换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概念，把它变成了暴力镇压异己的工具，才造成现在这样独裁专制的状态。

我记得谢队长曾拿着一叠我们交代的材料，对我怒斥说：“这样反动的一套理论，只有你们这几个人才说得出来，这类材料不需要旁证，就可以定你们的罪。”工军宣队一面对我威胁、恐吓，一面逼我们详细交待各种社会关系，以便确定指使我们的后台，把反革命集团的案子定实，把阶级斗争的故事编得圆满。但是，我们确实没有后台，所有的想法都来源于自己的阅读和思考。于是，案情进展受阻，陷入了僵局。工军宣队完全理解不了，我们为什么要冒着坐牢的危险去思考这些问题，这一定有政治目的；他们也理解不了，这样的“反动理论”怎么可能没有成人的点拨而自己形成。因此他们便认为我态度不好，抗拒交待，几乎天天“批判帮助”，逼我供出后台。我更是痛苦不堪，一则我真的没有后台，说真话就被认为是对抗运动。要我交待各种社会关系，是令我感到最承受不了的事。自己身败名裂，反正也就这样无所谓了，而要涉及别人，必定是连累别人，也就是出卖亲友，今后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于是，我尽量躲闪，避重就轻。但这毫无用处，我已经完全进入被禁锢的牢笼中，任何挣扎都是徒劳的。事后我才真正明白我国的整人制度的厉害，被整者只有三种选择：坦白、抗拒和蒙混，一般人往往都选择蒙混过关。其实，从实际效果看，却是最不理想的，在强大的专政樊笼面前必定是输得精光。工军宣队软硬兼施：“你实际上也是受害者，那些给你灌输反动思想的人在毒害你，如果不把毒根挖掉，我们怎么挽救你？”“你不交待别人会交待，你想保的人最后也逃不了，而你也因为抗拒有同样的下场。”于是。“忻鼎亮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我几乎接近崩溃。那时，我常闪过选择自杀的念头，最合适且可行的莫过于摸电门了。究竟是没有勇气还是无法摆脱看管，我记不得了，但这些日子里的精神苦难则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

工军宣队对付我们另一重要手段是将我们分别置于不同的位置，使我们各人之间产生怀疑和猜忌。在我面前，他会说XXX态度好，并抛出一些让我不安的材料，使我对同伙的不信任感增强。在另一人面前，则说我的态度好，并用同样手法进行挑拨，甚至使一些诈术。这样，我们的关系网越展越大，许多线索的焦点集中指向了我。在我们这伙人中，我的人脉关系最广，朋友也最多。往日，我一贯以“讲义气”自诩，朋友圈中也落下了“热情仗义”的好名声。现在，他们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连累，而且事情发展的后果难以预测，这些朋友会受到什么样的整肃？我们当时已被定为科大最严重的“叛国投敌反革命”小集团，在这种形势下，寄希望于别人在揭发时有丝毫的留情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我自己觉得输得精光，已经毫无抵抗的想法，只是不知工军宣队还要相逼到什么地步。其实，工军宣队想法很简单，他们就是要把“阶级斗

争的故事”编得圆满。如此“反动”的思想，要是没有“后台”的教唆，没有实质性的反动行为，而仅是几个二十多岁学生的“胡思乱想”，将使这一阶级斗争重大成果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笑柄。所以，他们从全面清查《齐卫东》的关系网入手，致力追寻后台。我放弃了无谓的抵抗，实事求是地交待了我和朋友们的思想交往，但确实没有人教唆我，也确实没有后台。这样，对我们的审查陷入了僵局。

为了进一步扩大运动的战果，大约在5月期间，工军宣队宣布成立展示“一打三反”成果小分队，向科大各系所在的驻点巡回批判《齐卫东》反革命小集团，我作为反派主角在全校被游斗。在小分队出发前，谢队长对我训话：“你明白不明白为什么选你去批斗，因为许小昆现在态度比你不好，你要好好在这过程中转变立场，尽快彻底交待问题，给你的时间不多了，再拖下去别怪我们没给你出路。”对他那种离间式的心理战，我心里清楚。选我去批斗，一是因为我的朋友圈大，各系都有一些好朋友，批斗我可起到两面施压的效果；更重要的还是希望在追后台环节上打开缺口。小分队由工宣队一位师傅和我系一位左派老师郭XX负责，还有五六位同学是正方的批判者，有四位“中间人物”关X、连X、徐立林及其女友（被我拉拢利用和拖下水的）上台发言，表明已经转变立场和我划清界限。反派仅我一人，站在台上被批斗。小分队自合肥出发，经铜陵、（1系）马鞍山、（3系）白湖农场、（4系）寿县、（2系）淮南（6系），游斗了一大圈，不但在本校，而且还到工厂和其他学校批斗。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每天在屈辱中度过，更令人难堪的是每次批斗会后都要我谈体会，被迫不停地自我侮辱。在其他系，我也看到了有些朋友也遭类似的境遇，在劫难逃的情绪更使我感到前景一片漆黑，几乎失去了生活的勇气。社会上的一些“反革命分子”境遇就更惨了，被杀、被关的遍遍皆是。我有大学生的身份还算幸运，观看过我的批斗会的工人们都疑惑：这样反动的人居然还没被抓进去？

5，侥幸免灾

也许是冥冥天意的眷佑，据说在6月份，中央下了一个有关在运动中被清查的学生处理方案的文件，强调了只要没有现行反革命行为的学生都应从宽处理，按时予以毕业分配。我至今也没有见过这一文件，在文革资料库中也未搜到，具体内容细节均无所知，仅知这一文件是对我这样的“反动学生”“皇恩大赦”。近期，我也采访过当初搞过我们专案并见过此文件的同学，他也记不起文件的详细内容，只告诉我：工军宣队对照了文件对我们的专案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讨论。当时主流的意见认为：我们虽然思想反动，但确实没有现行活动，也没有社会背景和后台，主要的“罪行”是小范围内的“反动言论”。而且，根据各人交待的言论绝大多数时间、地点、场合和内容都不能完全对上，能落实的“罪行”不多，所以宜从宽发落。但也有认为：我们攻击毛主席罪名很大，即便有一条，按当时运动的规则，也应从严惩处。那时，负责我们专案的是淮南煤矿的一位姓贺的干部，据说级别很高。他虽然思想属于文革主流派，但把握政策还算可以。在他的主持下，我们问题的性质从敌我矛盾中被拉了出来。

在那时，我除了每天面对写不完的交待和受不尽的批斗，别的事情一无所知。当看管我的人还一直说我态度不好，有重大问题没交待时，突然接到系里通知，要我第二天在落实政策大会上作认罪发言，并宣布《忻鼎亮学习班》结束。几乎与世界隔绝的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工军宣队就这样轻易放了我？他们会给我定个什么罪名？当时也不容我多考虑，必须要认真准备好明天的“认罪发言”。第二天，系里召开全系落实政策大会。会上，徐建中、钱德生、徐立林、焦大化、我及一个干部子弟，先后做认罪发言，表示和自己过去的反动思想决裂。除了那个干部子弟外，其余人都是我们“小集团”的成员。（许小昆因尚未结案，没如期分配，比我们晚走了一段时期）我那天的悔罪确有一定的诚恳度，当然思想上想通是不可能的，因为隔离期间仅是权力的高压。我的后悔是内心意识到不该如此轻率地用生命去作无价值的政治秀，还连累了许多亲友，另外，我对这样侥幸地劫后余生原因完全迷茫，不知该感谢谁的帮忙，这种复杂的情绪也带入了我的发言中。会后，我算是被解放了，获得了渴望已久的自由。虽然，这一

结果远好于我的心理预想，但我的审查结论是犯严重政治错误，内容还是相当可怕的。当然，所谓的“叛国投敌”这条，因查无实据没有写进结论中，但整篇结论仍显出“身带重罪”。我并没有留下当时完整的结论记录，但三条“罪名”的记忆是很深的，结论说我有攻击毛泽东思想、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文化大革命的言论，而且这一结论是进入档案的，它使我身处“另册”的阴影在长时期内始终无法消除。客观地说，这样的结论原则上并没有冤枉我，思想上是有的，言论也是说过的。问题是因言定罪的专制体制和政治运动，实际上扼杀了一代敢于思考社会问题的年轻人，使中国的社会沾上了一层浓浓的奴气。不久后我才知道，文革中定为犯政治错误的共分为六个等级，我属于最重的一级，再往后就是敌我性质了。比较其他造反派大学生的定罪，我并不算“宽大”。不过，总算暂时逃出了樊笼，也经历了失去自由的滋味，积累了难得的挨整经验。

劫后余生，我必须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我这次被整是必然的吗？哪些因素会造成政治运动中被整？今后如何避免这样的灾难再次发生？纵观我国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以及文革中多次劫难，凡是遭到政治整肃者都有其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必然因素是指运动政敌的涵盖范围，如果身处其中，挨整的可能性就很大。例如，清理阶级队伍，我们处于边缘状态，逃脱的概率就相对大一些；而一打三反运动，我们正是整肃的重点，逃脱的机会就很小了。偶然性是指被整者的综合人际关系以及运动中产生作用的大小，这种因素随机性很大，属于不可控范畴。人际关系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与掌权者的关系，二是群众关系，两者都可能对被整程度产生影响。一般说来，政治思想异端者多数性格张扬，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多少都有些问题，造成挨整概率变大，整肃程度也相对会严重。实事求是地说，我的人际关系应该算是好的，主要是因为我坦率热情，乐于助人，但也有恃才傲物的毛病，往往与掌权者关系较难相处。我们在一打三反中挨整，人际关系因素并未产生主要影响。当一旦成为目标被击中后，被整人方掌握的材料则成了定“罪”轻重的主要因素。按如今的法律，对思想犯的定罪时没有法理依据的，也无法确定“罪行”的轻重。但当时确有反革命罪的条例，也包括了思想犯，实际的执行更是把侧重点指向有“反动”思想的人。这样违反人权的法理，当时不但被掌权者当作震慑异端思想的专政工具，在一定的程度上还得到了社会的认同，社会上确实认为：私下的“反动言论”是有罪的，这也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整人运动得以胜利的群众基础。

其实，在1954年，建国后颁布的第一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自由。但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不断地用专政的手段整治异端的思想 and 言论，实际上属于法外私刑。更可悲的是这样一种政府违法行为，在领导意志和舆论宣传的强力下，把批评政府同反革命罪硬性等同起来。这样，文明社会公认的政府违法行为变成了合法化、常态化，而且得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认同，也成就了整人运动一次又一次地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在一打三反中，具有“反动思想”的人按“反动”程度划分，大致可分为四个级别。第一级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各种形式的发泄，具有这样想法的人很多，群众中对这类人大多数是同情的，也就是说，这样的“反动思想”有相当大的共鸣度。所以，如果仅有这类言论者，多数不会挨整，除非人缘很差当了替罪羊；第二级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及其成员有攻击言论，这就相对问题严重一些，特别是对林彪、江青和周恩来的批评和讽刺可能被定重罪。但在群众的内心对这类的“反动思想”也有一定的容忍和同情；第三级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批评，在“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的时代中，这无疑是头等重罪，在群众中也基本没有认同度。但在一定数量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中也不乏同情者；第四级是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质疑，在当时是极少有认同者，仅有个别知识界思想先驱者，就全国总人数比例相对是非常小的。客观地说，我当时的思想已逾越了3。5级，已处于严重“脱离群众”状态，人际关系瞬时急剧下降。平时比较要好的同学们大都觉得：真想不到忻鼎亮堕落得那么快，思想竟会如此反动！一些道德上的亮点也被作了另类的演绎：坦率成了作伪，热情成了别有用心，乐于助人被说成拉人下水，我当时真有强烈的众叛亲离孤立感。即使在我“被解放”以后，有

个当初的好朋友一本正经地对我说：“鼎亮，今后千万不能再反对毛主席！”还有个上海的好朋友曾直言相询：“那时说你们叛国投敌是不是真的？”我如实相告：“仅有逃出去的思想。”他追问：“如果当时有机会，你会走吗？”我仍实说：“会的。”他长叹：“我们的思想差得太远了。”

我渐渐明白：这样的整肃思想犯的制度在当时确有一定的社会认同性，由于共产党长期垄断了舆论，再被频繁洗脑状态下，老百姓要探索社会发展的真理是不可能的，我的囹圄之旅确有其必然性，可谓在劫难逃。在运动前的各种防范措施基本上是没用的，成为目标后企图避重就轻蒙混过关更是低估了整人者的能力。如果一定要作策略的比较，选择一言不发或者彻底坦白要比选择蒙混过关略好些。一言不发的前提是“反动言论”散布面极小，且被整者有相当好的心理素质。可惜大多数被整者往往都选择蒙混与整人者周旋，结果当然败得更惨。我相信，大多数有被整经历的会和我有同样感受，只是要承认自己有“变节”行为难免尴尬，要知道，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容许“反革命”“坚贞不屈”的。

四，“另册”阴影下生活

1，部队农场锻炼

我算是等到了毕业分配，在填志愿时，我尽量填贵州、吉林、广西等边缘贫困地区。大概是为了不给我“叛国投敌”提供便利，将我分到了中原河南，先到军垦农场劳动。我当然没有任何资格讨价还价，回上海探望父母十来天，就早早地到商丘8181部队农场报到了。惊魂未定的我马上就进入了受严格管束生活，一切都和部队新兵一样，除了要承担强度极重的劳动，整天还都生活在部队干部的监控下。让大学毕业生到军垦农场锻炼，是文革中新创的改造“臭老九”的重要措施，为了使这些曾经有过不受约束经历的年轻人夹紧尾巴。当然像我这样有严重问题者更是要倍加谨言慎行，不能有丝毫放纵。我非常明白，我的档案已将我归入“另册”，考验我忍耐力的生活从此开始了。

我所在的部队属于武汉军区，在商丘仅呆了三个多月，就转到6090部队，到湖北沉湖农场去劳动锻炼。沉湖位于汉川、天门和沔阳三县之间，原是个围湖造田的劳改农场，条件相当艰苦。我们连分在农场砖瓦厂劳动，工作就是烧砖烧瓦。我们班承担的是窑厂最重活儿装窑和出窑，就是把泥砖坯摆列在窑里待烧和把烧好的砖装车运出窑外。我们工作八小时都在窑内，出窑时的温度已经超过正常人忍耐的极限，许多同学都有在窑内昏厥的经历。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胁迫下，多数昏厥的同学都是在外边被凉风吹醒后继续回窑内劳动。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当然更不能因此而回宿舍休息。年轻人的适应性是很强的，大约个把月后，因高温昏厥的事就基本没有了。我们在窑内不仅要适应高温，而且要非常快的速度装窑、出窑，出一窑砖的总时间记录频频被我们打破，当地的民工也为我们这些大学生能如此拼命劳动而感到惊讶。

我是“戴罪之身”，到了农场后就暗自警戒自己：好好劳动，谨言慎行。开始时，我像阿Q一样，非常怕人发现头上的“癞疮疤”，闭口不谈文革和学校里的事。实际上，大家很快就知道我在学校里犯过政治错误。一是因为我们连里有很多科大的同学，二是连领导在全连大会上已明确点出：我们连里有一些犯过政治错误的学生，希望能好好接受改造。我这才慢慢知道，类似我这样的人却有一定数量，其中有一些著名“反动组织”的成员，如：湖南《省无联》、《红色怒火》、湖北《北决扬》、复旦《孙悟空》等，相对说来，我的性质较为严重。我原以为，同学们也会像在一打三反中一样，像避瘟疫似地避着我。实际上，情况要比我想象的好，同学们大多数比较友善，连领导也没有明显的歧视。但我的精神压力仍很大，不仅在开会时经常要为自己过去的“污迹”不停地自我批判（？），而且在平时的言行中不能有丝毫差错，否则就要冠以抗拒改造的帽子并与过去的“反动思想”联系起来。我又不能在各种活动中表现出过分积极，

以免被人认为是作伪；我更不能向管束我们的军人献媚示好，这种恶心的举动我实在做不来。我唯一能选择的保平安措施就是拼命干活，我那时身体非常瘦弱，1.76米的个头，体重仅一百斤刚出头。像挑担、搬重物一类的硬活，我无法与人比拼，但一些比速度、比灵巧的活，我通常都干得很好。例如：装窑、出窑，我总是在砖多的外道，抹砖、搬砖的手脚很快。一些农村同学看我这样干活，连连摇头，善意提醒：长期劳动的农民没有这样干活的。我只好苦笑，我只是为了有个好的表现强作的劳动秀。在几十年后，我用健康“还了债”：我的腰和膝关节都有器质性的伤病。

当然，我在农场的生活也并非顺利，潜在的惊险和歧视性的屈辱也时有发生。排长是个比我们年龄还小的农村兵，文化程度很低，对大学生们面上显得盛气凌人，以掩盖自己内心的自卑。所以他特别喜欢同学们当面奉承，而这恰恰是我最不擅长的“软肋”。他觉得我这样有严重问题的人竟敢对他表示冷淡，所以就不时地寻衅找茬。有一次，我被砖头砸伤了脚，大脚指甲全黑了，恰好第二天要拉练行军，将走一百多里路。我们班长（同学）提出，忻鼎亮明天在家整理内务，不去拉练了。排长坚决不同意，说这点困难都不能克服，哪像接受改造的样子？我制止了班长继续申诉，第二天，咬着牙硬是没有掉队，坚持走完了一百多里路。回来时，全身发烧，淋巴肿得像核桃般大，袜子上全是血，脱也脱不下来。还有一次，我和一位中南矿冶的同学私下议论副班长的短处，被告发到连里。连里竟上纲上线，认为我是“旧病复发”，抗拒改造。幸好当时正值河南到湖北调防，才躲过了一劫。可见当时我的言行必须百倍小心，才能免灾。

最险的一次当然是71年初清查五一六运动，虽然部队已明确运动的形式只搞正面教育，但当时的气氛还是相当紧张。小病大养、浪费粮食等小缺点都当作阶级斗争动向来批判。有一同学在批判会上发言，竟提到：我连有叛国投敌分子在抗拒改造。幸亏那时的连领导还算比较掌握政策，再加上我有较好的人缘和良好的劳动表现，有惊无险的度过了这一关。直到九一三林彪事件宣布，中央号召学习马列著作，整个政治斗争的紧张气氛松了下来，我的日子也相对好过了许多。说实在的，那时号召读的《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六本马列著作，我在文革前期已熟读过，随口讲述书中内容让同学们感到惊讶。有些同学就大胆地在会上表扬我：马列著作学得好。总之，随着阶级斗争弦的松动，我的人缘和处境也呈正相关上升。这样的劳改生活过了一年半，劳动锻炼结束，我被分到了河南兰考县科委工作。

（未完待续）

~~~~~

## 【不堪回首】

### 致聚会同学——回忆“一打三反”

• 孙进和 •

（简介：1970年初，中国科技大学南迁合肥落脚未稳，近代物理系师生被集中白湖农场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深挖“帝修反别动队”。200名学生，120名受到牵连，80名建立了档案，最后有组织处理结论的23名。全校十名左右学生教工自杀。这一段个人亲历中国科技大学文革历史，文中涉及人物，均为真实姓名。）

虽然我没有计划参加2014年近代物理系64、65级同学聚会，但是在关注着同学们的动态。看到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出现在Email里，一种怀旧的惆怅油然而生。

还是说点什么吧，用自己的经历，给科大的裤裆里补上一块补丁。虽然补上了不好看，不

补在隐私处留下一个洞，不是更难看吗？

的确，科大的同学是优秀的。就我们6544总共20人的小班来说，其中有的领衔博士生导师；有的位列企业翘楚；有的做了幕僚高官；有的发了横竖大财；最不济的流落中学教书，屈尊杏林坛主，大材小用虽有恨，珠落草莽亦闪光。

相形之下，我则惭矣愧哉。我没有什么瞩目成就可以向老同学展示。如果非要找人生亮点的话，也是萤火微光聊以自慰而已。这几十年我完成了人生的转变，由一个专制制度批量铸造的驯服工具，转化到一个独立思考的自由人，回归了人性。

刚入科技大学，我还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单纯、腼腆青年。苍白的脸上还残留着大饥荒时期的菜色。冬天穿一条北方农民的大裤腰甩档裤。这种中式棉裤没有制服裤前档的开门，肚子堆着窝窝囊囊的三层褶皱。一些邋遢农夫会在前档滴上尿液，一个冬天下来会泛白。（说实在的，我在农村倒没有注意这一现象）宋国权就不分清红皂白称我的棉裤是“尿碱裤”，实在是天大冤枉。

除去穿着土气，思想还傻气。从来没有想到接受公平教育是青少年的正当权利。对于能领取18.5元的助学金入读著名学府而对党和政府感恩载德。

然而那时的我也有我的困惑：全国的大饥荒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公社的田地荒芜了《人民日报》却还说连续大丰收？为什么农村干部欺压百姓无处申诉？——这一切黑暗面我曾经善意地认为中下层干部蒙蔽了中央，一旦毛泽东了解了实情，一切都会纠正。

进入科技大学9个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批判三家村“燕山夜话”，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刘少奇“三自一包”让我彻底明白了：原来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一条坚持三面红旗、饿死人不偿命的路线；毛泽东是中国大饥荒的始作俑者；毛泽东是一些基层干部为虎作伥迫害农民的那只虎。毛泽东念念不忘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就是要找一个在他死后还继续奉祀香火的继承者，目的是逃避被追究历史责任。

以马列主义为标榜的毛泽东和他的司令部，实际上是唯心论，唯意志论的大本营。毛泽东创造的一系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都是为加强个人独裁专制的诡辩学说。中国政权已经沦为一部法西斯机器。

文化大革命是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一颠倒，把原来被遮盖到底部看不到的丑恶翻出来了。看的越多，心理的愤懑越多。可是在当时严酷的专政气氛下，表面上还得做出“誓死保卫”、“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样子。喊口号心口不一，让我感到人格分裂，精神痛苦。

忍受不住内心里的熬煎，我试探着和一些同学交流思想。发觉持同样观点的人还不少，而且越来越多。包括一些在运动初期有“联动思潮”的革命干部子弟，对于毛泽东的认识也渐渐持批判态度。当然他们的转变起源不在于挨过饿，而在于他们的父辈受到文化大革命冲击，令他们由红五类一夜之间变为“可教育子女”，骤然的政治地位落差，从天上掉到地下，摔醒了一些人……

一到白湖农场，我就感到形势不妙。南字127部队要借助“一打三反”运动整肃科技大学的意图显而易见。深挖反革命学生不可避免。我忧心忡忡盘算如何避过这场灾难。在“一打三反”运动的预热期，有一个“公物还家”运动。我主动归还了用公家木板制作的箱子，目的

在于早些撇清自己。那些木箱摆在连队小广场上展览。其中大小两只做工精细，人们啧啧称赞，那就是我的处女作同时也是收山作品。

不久，我看到郭伟丰被限制起来，坐在路边呆呆地写交代材料。随后传出郭伟丰、杨积胜、吴理反革命小集团的说法。我估计郭伟丰、杨积胜顶不住压力，会把我给端出来。

大学前4年，我和郭伟丰没有深交。他的那种高干子弟张扬气势，让我疏而远之。科大搬迁，我是留守队员。郭伟丰特意到我的房间住了一夜，进行过一次彻夜长谈。他让我估计未来中国形势。我对他说过一句话：“林彪上台，中国会出现军事法西斯主义统治”。

果然，军宣队很快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再让参加劳动。虽然我很厌恶白湖农场的超体力劳动，我的腰肌劳损就是在巢河船上卸化肥袋子压伤的，以后断续疼了几年。但是参加劳动是一个安全信号，说明你还没有被置于运动靶心。

我认真回忆了和郭伟丰的谈话，捉摸对策。既然抵抗不住，就索性交代了攻击林副统帅的言论。专案组说我的交待和郭伟丰的揭发口径吻合的很好，军宣队认为我的态度老实，就解除了隔离审查。

没几天时间，虞文泽在厕所给我暗示，马梅杰反革命小集团被攻破了，涉及到了我的一些言论。在当时气氛下，通风报讯风险很大。

果然，我又第二次被隔离审查。我认真回顾与马梅杰谈话的过程，交代了自己和马梅杰议论过“江青有小资产阶级情绪”的话题。被隔离审查一段时间后，再无新的问题揭露，军宣队似乎又有解除我监管的意思。

不料，又一次风云骤变，政策攻心组同学突然开会对我厉声喝斥，要“竹筒子倒豆子”彻底交待问题，在他们冷言冷语的敲打中，我捕捉到信息是秦广文也被围歼了，又扯出我的一些言论。这让我彻底崩溃了。

我在秦广文面前是没有禁忌的。两人从文化革命中期就开始质疑文化大革命，私下点评时政：毛泽东好大喜功；不懂工农业却瞎指挥，四处巡视乱作指示；大跃进造成大批农民饿死却诿过抵赖……

1958年毛泽东视察全中国，专车曾经经过我的老家正定县。正定县干部登车向国家主席汇报工作。妇联主任说：“我们正定县的妇女举行过罢工了，坚决要求成立大食堂，结束妇女几千年围着锅台转的历史，解放妇女。”实际上毛泽东在巡视过程中表扬了食堂吃饭不要钱是共产主义新生事物。正定县干部闻风而动，紧急命令从即日起不许各家烟囱冒烟，一律集中吃大锅饭。妇联主任编造的妇女罢工拒绝做饭的谎话，令毛好生喜欢。全国推行食堂化就成了农民自己的迫切要求。我看到这段史料，感到好气好笑，抨击这是典型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例子。昏君佞臣一唱一和，制造民意，整治农民。

那时候天津大学红卫兵8.13收集了各个历史时期毛泽东未公开发表的谈话。咸淡不拘，荤腥具陈，编纂成砖头厚的油印本，名叫“毛泽东思想万岁”。从那本书里，你可以发现许多毛泽东前后矛盾的论说。有明哲之言，有昏聩之言；有亲民之言，有殃民之言；有诚实之言，有奸诈之言……总之从那里你可以追踪到毛泽东的发迹历史，你可以找到毛泽东的话去驳斥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本“毛泽东思想万岁”，让我走向批判毛泽东之路。

秦广文一开口交待，我的最要命的一道防线被突破了，因为我们一起涉及的话题很多，不好对口了。我怎末交代也过不了关了。连部谢指导员几次吓唬：“你的这些反动言论，拿到外单位，一条两条就够枪毙了。”

既然一条言论已经够枪毙，那末再有几条也就不在乎了。我冷静下来决定换一种策略，系统交代自己是如何转向批毛的思想历程，尽量不涉及具体话语，也不涉及他人。专案组再拿具体的反动字句来和我对证，我就说，“这话符合我的思想，可能说过。但想不起来在那里说的，在什么地方说了。”或者说：“不象我说过的话。”但是态度要诚恳，要痛心疾首表示服罪，愿意脱胎换骨改造，争取从宽处理。

从此我就一直被全天候隔离监视，白天起床就开始写交代材料，深夜坐在烛光闪烁的蚊帐里反省。被揪出来交待问题的学生很多，每人一支蜡烛，在黑黝黝的晚间，形成灯火辉煌的白湖夜景。即使无所交代，也要在床上坐得挺直了，保持到12点钟，不能打瞌睡，专案组同学就在旁边监督。去厕所也有人监视，确保厕所里没人了才放我进去。这样松松紧紧，打打停停，从5月开始，直到8月份结案毕业离开白湖。

军宣队二排长在全排批判会上说：“我们终于把隐藏很深的反革命分子孙进和挖出来了！”排长没料到这个出身贫下中农、貌似诚实可靠的学生，却装了一肚子的坏水，险些把他这位阶级斗争觉悟高的小军官蒙骗过去。（自我评价：本人本质上是非常诚恳有信的人。）

随后军宣队安排了我在全系“一打三反”会议上发言。我把这次发言当作争取从宽处理的一个机会，一面高声地批判郭伟丰、马梅杰反革命小集团，一面大泪滂沱地忏悔自己的罪行。我没有其它选择了。

最后公布我的组织处理结论，听起来象是法院对强奸犯的判决书，姑且算是我强奸了毛泽东吧：

“孙进和，男，现年23岁，河北省正定县人。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反应堆工程班学生。该生在无产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放弃思想改造，受到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思想逐渐走向反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期，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该生认罪态度较好，根据党的政策研究决定“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最后是安徽工军宣队，近代物理系革命委员会的签署盖章。这是我所能期望的最好结果了。当时，我争取的是不要判刑，赶紧毕业走人。

回忆完白湖的厄运，我声明一点。我没有责怪郭伟丰、杨积胜、马梅杰、秦广文等同学的一点意思。没有抱怨你们不够坚强供出了我。相比之下，我一旦陷落，就举双手向军宣队投降，显得更没骨气。重压之下，必有怯夫，这是普通人性。重压之下，宁做玉碎不做瓦全，是圣人一级的高尚人性。可惜我们这些“帝修反别动队”（周恩来语）很难升华到圣人，如果真是圣人，恐怕也活不到今天赋赋歪歪写回忆录。

我们能在那个黑白颠倒的时代，做一些离经叛道的思考，已经难能可贵了，我们应该自豪。没有人有资格嘲笑我们的意志软弱，因为他们连软弱的行列都不敢加入；也没有人有资格嘲笑反革命小集团不堪一击，一朝分裂，顷刻瓦解。因为他们没承受过法西斯大集团锤子的打击，何况那锤子就是他们帮忙装上了手柄。

在制止法西斯屠杀无辜的设计上，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让群众进化出更坚硬的脖子，以致崩卷了屠夫的刀刃，让屠杀进行不下去。正当的思路是我们要设计一种让屠夫畏惧的制度，让他们没有胆量举起屠刀来。竟敢口口声声向民众亮刀亮剑者，就要背负反人类罪，遭到刑法和历史的无情追究。以色列人就在不弃不舍地干着这件事，他们让德国法西斯分子无立足之地，只有改名换姓、畏罪潜逃。

1971年9·13 事件发生，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中国政治气候开始变化。中国科技大学调回我的档案。我的三反言论中，许多攻击毛泽东的言论和攻击林彪、江青的言论纠缠在一起，难以撕扯清楚。这样工军宣队在白湖用了几个月逼出来的“恶毒攻击”言论，做为“反扩散”材料一并烧毁了。

有了白湖一劫，我不断告诫自己要谨言慎行，把精力用于业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有了较大进步。但是毛泽东这个精神枷锁始终没有打开。全国电子工业学大庆会议和全国科学大会都组织了代表瞻仰毛泽东纪念堂，虽然我心里早就对毛氏心存鄙夷，但也只能板起面孔，一本正经两次通过水晶棺。在全国电子工业代表谒拜毛灵的那次，静谧的灵堂突然爆发出尖厉的嚎啕，那是河北省的一位女劳模实在压抑不住无产阶级感情，发出的撕心裂肺的悲痛的哭声。还断断续续地说：“毛主席，你老人家走了，我们可怎么办呀？！”

“怎么办？这个祸国殃民的独夫民贼死了，中国的事情就好办多了！”——当然，这是我的腹语，不敢通过声带。女劳模一步三顿足地忠孝嚎啕并没有感染听众，大家都默默地、怪怪地看着她，毛灵堂里形成“一蛙独鸣，群鱼消声”的尴尬音响效果。

我感到我的精神世界依然属于半恍惚半压制状态。1989年，我到美国进行技术考察，恰逢天安门广场学生民主运动兴起，我判断新一轮的镇压又要降临。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反了吧！这次老子不陪你们玩了！决定留在美国。我真正的精神解放自此开始。

在美国，我接触了大量国内禁止流传的史料，看到各种观点的交锋，颠覆了国内灌输给我的许多信念，从全方位看中国，反而对黑幕笼罩的中国社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中国黑社会的传统，杀手把刀架在受害人脖子上时，要发表一通黑社会宣言：“老子今天让你死个明白，你是得罪了X老爷了，我们是替X老爷送你上西天的！”（如林冲在野猪林就听过这一通宣言）黑社会固然黑，尚且知道尊重临死者的知情权，让死者死个明白。

可是中国的政治连黑社会的透明度都没有。执政者掩盖和歪曲历史上重大人道悲剧事件的真相，剥夺人民的知情权，企图把谎言坚持到永远。正如习近平反对的——“搞历史虚无主义”。

谁是大饥荒期间饿死几千万人的元凶？

谁承担夹边沟的数千名右派分子被抛弃荒野，死而被食尸的罪责？

湖南道县6千余名地主富农及子女被野蛮处死甚至满门灭绝，政府缉捕审判凶手了吗？

天安门广场上究竟打死了多少群众？

周永康的政法委究竟冤杀了多少无辜生命？有没有法院、监狱、医院勾结，活摘囚犯器官的反人类罪行？

……

层层积压震撼全国的人命大案，受害者死得不明不白，家属亲人也活得不明不白。你想明白吗？“颠覆国家政权罪”伺候！法律成为对付民众的矛头，成为人们争取正当权利的威胁。

毛泽东的遗体是历史遗留下的一块垃圾。也有精神威胁作用。不是说五脏俱空的尸壳能召魂聚鬼作祟害人，而是当朝政府在释放一种信号：毛时代的罪恶不可追究，毛镇压民众的手段可能重新启用。归根结底，是现政权借尸吓人。

我不由得想起很久以前看到的一段动物世界影片。一群野猪在丛林中觅食，忽然它们警觉地停下来，原来在它们前方卧着一只死豹子。豹子已经腐烂得肉消骨枯，塌瘪的豹皮还勉强维持着豹子形状。野猪们围成半圆圈，鼻孔喷出咻咻的告诫声音，小心翼翼向死豹子方向推进。这时一阵微风吹过，一团腐朽的皮毛轻轻一翻。其中一只野猪吓得掉头就跑，顿时引起雪崩效应，一群野猪顷刻逃窜无踪。

我的感慨是，如果我继续留在中国这块丛林里，我也会是这群野猪中的一只。在丛林的法则支配下，我连免于对死豹子恐惧的自由也没有。

免于恐惧，独立思考——这不是事业成功的标准，确实是回归人性、实现自我的最低条件。老同学们，拙见陋论令诸位见笑了。

2 0 1 4 - 3 - 1 6  
~~~~~

【难忘岁月】

告别未名湖的日子

• 郭娜嘉 •

◇ 发配新疆

1 9 6 8 年 1 1 月突然传出要毕业分配的消息。据说原本的高教部分配方案让驻校军工宣队退了回去，新分配方案除了在大山深处的三线工厂（符合机密和保密条件的）之外，不分是什么专业，通下去劳动锻炼接受再教育，大西南，大西北，大东北……，我自愿报了最远的新疆。

4 9 年后党领导的政治运动从没间断过，可没有一次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牵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触动了每一个人的灵魂，我的家也不例外。我父亲是老北大，当年投师于中国地质泰斗谢家荣教授门下，毕业后留校在北大地质地理系担任助教。抗日战争爆发后父母随西南联大辗转途径遵义时生下了我。抗战结束后，父亲公派留学美国。4 8 年底父亲回到祖国，将全身心奉献给新中国的地质事业。文革中，他被扣上了几乎所有的黑帽子“反动学术权威，钻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里通外国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被关进了地下室。当时我家中一成员因她三姨夫是 8 3 4 1 的团长，在家里便也飞扬跋扈。母亲低三下四委曲求全，只有我敢和她论理儿。在那个年代，这个女人一句话能要了我们全家人的命。谢家荣老夫妇不就双双去了吗？母亲为息事宁人，把我赶出家门。我只好一直独自住在北大 3 5 楼，直到两派“巷道战”开始我才搬去二哥家当“小保姆”，恰值二嫂生产，一间平方小屋收留了我。北京的生活让我感到压抑，我想要走得远远的。

工宣队，在 2 0 几个报名者中指定了我，并当众宣称对其他好同志的积极性和热情要保护，言外之意……？新疆的名额就该由我这样“家庭和社会关系极为复杂的人”去承受（工宣队的原话）。卢环是因为不顾工宣队师傅的劝阻受我连累才去了新疆。原本是我自愿报名，最后却变为发配，这种变味让我有点难于下咽。多少年后我才得知，家中的那位曾去北大工宣队检举我

立场有问题，划不清界限，帮我爸写检查……。究竟我的档案袋里都塞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但这一人性扭曲的后果着实让我后来因此吃了些苦头。

临行前我们去地下室看爸爸，就像在监狱探监一样旁边始终站着造反派看守。听说我就要去新疆，爸爸眼里含着泪花。我什么也不敢说，甚至没敢告诉他我和卢环结了婚，怕他受不了。我说了句“相信群众相信党，保重”在我眼泪喷涌而出之前转头跑了出来。

◇ 奇台解放军农场轶事

我们到新疆后，由毕业分置办再次分到距乌市几百公里外的奇台解放军农场。零下30几度，我们十几个人被装上了一辆无蓬解放卡车送往奇台。大家衣服单薄，有两个南方来的男同学甚至连顶棉帽子都没有。我们女同学把围巾解下来给他们围上，凡是能找到绳子的把腰系上，然后紧紧簇拥地缩在一起，把所有能披的都披在身上，就这样也无法抵御敞篷车上寒冷刺骨的疾风，我们的手脚很快麻木了，嘴唇青紫连话都说不清楚。我们开始拼命地喊叫“停车，停车！”……最后我们用拳头敲打着驾驶楼后窗玻璃，用缸子和水壶敲砸着驾驶楼顶，车才终于停了。然后，10几个装束得奇特的怪物在公路上狂奔的情景如今还历历在目。就这样，我们开车走一段，下车跑一段，于掌灯时分到了农场，一个永远忘不了的69年新年除夕。

我们所在的解放军农场有两个学生连队，一连全部是新疆本地毕业的大学生。我们二连则全部来自内地，共分三个排，九个班。排长班长由解放军担任，班副则由他们指定的根正苗红的同学担当。场部坚持贯彻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对我们实行无产阶级教育改造的政策。农场的解放军战士们都不愿意接近我们，有一种明显的歧视和提防。倒是排长和班长在和同学们朝夕相处的相互了解中，结下的关系还不错。我们那时是天天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顿顿中饭前跳忠字舞，然后乌烟瘴气尘土飞扬地开始吃饭。白天劳动，我干过扛麻包，打井砸夯，浇水，割麦子，拔苦豆，掏大粪各种脏活累活。我和体院体操系毕业的黄哲林（资本家出身）是班里的一等劳力。晚上则开会斗私批修。只有一位来自湖南的小个子男生，每会必发言，每发言必痛批自己反动地主阶级出身的烙印和表达坚决革命脱胎换骨的决心。而绝大多数人以沉默来抵制。62/63届是文革中最活跃和最有能量的两届。因为文革爆发时，新生对学校还不太了解，而毕业班就要离校了对运动也不够积极。在校三，四年级的学生自然就成了运动的主力，起了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一腔热血撒完了，被人当枪使过了，就被一脚踢开了，成为文化大革命最大的牺牲品。有这种想法的人我相信不在少数。因此连里决定树靶子批“反动学生”。最后由于西瓜地开枪事件和拖拉机翻车事件的发生，批反动学生算搁浅了。后来我的班副透露给我，我曾是被连里内定的“反动学生”之一。

每到星期天休息日，奇台县城是同学们购物的唯一去处。有时碰上场部的拖拉机就顺便拉拉脚。这天在从奇台回场部的路上一帮同学看见场部的拖拉机开来就喊停，拖拉机的拖斗上仅坐了两个人完全有空地，可解放军司机非但不停还加速企图绕过拦车的同学逃跑，结果拖斗车翻了，司机还不知道，以致一位车上的一连女生被压在车斗下拖了10几米，拖拉机才让愤怒的同学给拦截下来。这是翻车事件的故事梗概。

新疆戈壁滩只要有水是都可以耕种的。农场在我们两个连同学的辛勤劳动汗水付出下打了好几眼机井扩大了耕地。除了农作物外，我们还种了几亩瓜田。按说我们自己有权利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场部也应该正常分配一些给我们学生连队。对于场部不适宜的作法同学心中有气，因此经常有人去偷瓜。这种行为肯定是不对的，但20几岁青年人的恶作剧绝不至于用荷枪实弹去对付。幸运的是，子弹擦耳而过，没酿成更大的悲剧。这就是西瓜地开枪事件。

在这之后，同学们不分曾经的天派地派，也不管家庭出身和所谓左派右派，齐心拒绝批斗

“反动学生”，齐心为翻车致残的女生讨取公道，齐心收集整理材料上告。那是个天高皇帝远的边疆小镇，又在那个年代，但最终我们胜利了，原部队被调防。70年春节前我们在新换防部队不打击报复的允诺下被再次分配。我再次由于那该死的档案，不具备在新疆无线电厂工作的资格。我和卢环继续被发配到南疆库尔勒面临再次分配。分配方案公布下来后的那个春节，我们连男生几乎全军覆没，个个都喝得酩酊大醉。我却很清醒，我那时甚至都做好了被分到农村去挣工分吃饭的最坏打算。

◇ 库尔勒的春天

春节过后，我们向南疆进发。这次是一辆带蓬的解放卡车，路径达坂翻越天山。一路翻干沟过戈壁寸草不生，当汽车一转过铁门关，眼前一片桃红柳绿，孔雀河水清清，这正是我曾梦想过的新疆！那突然的转换，鲜明对比的一瞬间牢牢地留在了我的脑海中。随即我们的车消失在尘土飞扬的尘埃中，“库尔勒到了！”。那会儿的库尔勒县唯一的一条大“马路”是有约10公分浮尘的土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坑洼泥泞。后来的柏油马路还是我们全县城职工义务劳动修建的。

在库尔勒我再次被告知，我没资格去广播站，因为这是县革命委员会的喉舌机关。我被分到了库尔勒县中学。卢环分到了广播站。不管怎样，仍带工资，好过我的最坏预期，我们高高兴兴在广播站安了家。一间约十平米的土房一张床，包装木条箱翻过来铺上报纸是我们的餐桌，包裹上报纸的两块土坯是我们的板凳。很长一段时间，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那时巴州各县广播站的技术员都是全国各名牌大学毕业生在担任，仅库尔勒就积聚了十几个来自内地的大学生，我们都成了好朋友。我家是大家最经常聚会的地方。

◇ 库尔勒县广播站小院

来到库尔勒县城，当年标志性的建筑就是库尔勒县电影院了，库尔勒广播站就位于电影院南侧的一个小院里。正对大门的整栋砖房是广播站办公室和机房，大门左侧一栋一字展开的5，6间土坯房是家属宿舍。第一间就是我的新家，我的新房，可以这么说吧。从得知我被分到新疆，妈妈要求我们俩结了婚再走，我和卢环在北京领了结婚证，大学的两床被子和妈妈为卢环买的一件棉大衣就成为我们的全部家当。临行，一个简单的婚礼加告别家宴收到的两件礼品：二哥嫂送的一个脸盆和小姨送的一个搪瓷尿罐伴随了我们新疆整整九年。在农场时我们过的是集体生活，我把我俩除伙食和日用零花钱外的所有工资全都按月寄给了南宫农村，手里积蓄毫无。此时，一个水桶，一口锅加一顶水缸算是我们新房额外的置办。我婚后的日子就从这儿开始了。

在那个时代，我虽到哪儿都被作为教授的“千金小姐”另眼看待，但我最了解我自己，从小的放养生活方式和从九岁就开始的住校独立生活，使我面对家徒四壁，无米之炊仍可以过得津津有味。从最初无油无盐的酱油烹炒西葫芦，到后来的鸡鸭鱼肉满桌我们的家永远是每个周末和逢年过节朋友们聚会的首选地。每个周末都会聚在一起“敲三仙”的有巴州文化馆北大图书馆系毕业的宋学忠夫妇，库尔勒公安局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的杜德成夫妇，巴州广播站的潘志国夫妇和西安交大的胡孟浩及巴州物资局北京财经学院毕业的张乐华夫妇。逢年过节则有来自轮台广播站的北大物理系毕业的王凯歌和尉犁县农机站北大地球物理系毕业的迟国彬加入。我们在一起天南地北高谈阔论，对我模仿巴州某一罐头厂流水线上一式的大学生女工在从事着贴商标，扣瓶盖的简单重复劳动的演示捧腹大笑……那种苦中作乐的场景记忆犹新。

□ 摘自《告别未名湖》

~~~~~



## 【史海钩沉】

### 公社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 ——回忆北师大文革中的一段群众辩论的公案

· 安希孟 ·

公社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这篇文章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文章。你不可穿凿附会自作多情妄加揣度。也许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文革中北师大大字报的学术公案，引人深思。本文只是想证明，思考的一代青年即使错了，也不应该受到过火惩罚。“即令一个囚犯的犯罪念头也比天堂里的玫瑰花漂亮。”（马克思）然而1971年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却歪曲公社，拿来为专政打压不同意见服务，走资派成为攻击的靶子。

文化革命中我在北师大，有一位叫李文博的理科学生，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叫做《公社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我等不明究竟，如堕五里雾中。随后北师大公共政治课教师的《红梭镖战斗队》奉命反击，斥之为“无政府主义”思潮。说来奇怪，有一次我在北师大图书馆居然和李文博同桌看书，他看的是天书马克思恩格斯文选。天哪，我哪儿能看懂哪。茫茫人海，互不认识，但觉着他是人才。几十年后的今天，将近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的我，忽然有所领悟。毛泽东1958年号召城乡建立公社，1966年欢呼上海公社，北大有新北大公社，北师大有井冈山公社，地质学院是东方红公社，都是践行“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各地各级革命委员会代替党政人大政协成为唯一的权力机构。这或许是对巴黎公社探骊得珠，得其神韵。如果抛开党内政治斗争单做历史考辨，应该说，毛泽东当时有践行马克思的愿望。北师大的李文博同学后来淹没无闻，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是思考的一代。说句题外话：当年被打成反动学生推迟毕业的人，许多后来成为特级教师和中学校长，因为这些才子，虽无佳人红烛添香，却个个聪颖无比才华出众才树大招风。北师大多收贫寒子弟，衣衫不整但聪颖好学。现在提倡廉政，有人重提公务员拿普通工人的工资。忽然觉得1970年毛泽东倡导读《法兰西内战》一书，如果一直思索，还真能悟出几分李文博式大道理。

1871年3月18日法国巴黎工人举行起义，反对第二帝国和外敌入侵，炸毁旧的帝国国家机器，并且建立共和国。尽管这个社会共和国只存在了两个多月，但工人阶级的大无畏的创造精神和社会解放的原则是永存的。公社失败以后，马克思写了《法兰西内战》，指出：“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1〕巴黎公社的原则究竟是什么呢？这个原则就是消灭帝国国家机器，建立社会解放的公民自治的社会共和国。巴黎公社是工业城市乌托邦，不同于亚细亚农业农民乌托邦。公社实行低薪制，不同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马克思认为：“工人应当打碎的已不是旧社会的那个比较不完整的政府权力的形式，而是具有最后、最完备形式的这一权力本身，也就是帝国。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2〕让异化了政权回归自身。让异化回归同化。

回归马克思，有青年学子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1966年10月17日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文博写了“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的大字报，鼓吹一种大民主和国家体制改革的新思潮。他是受到毛泽东说的“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改进社会主义制度”思想影响的。不过非常奇怪，当年自己率先造反、心目中就没有校长校党委校行政的井冈山集团，却

把李文博当做无政府主义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批判了起来。有个学生叫蒲寿章，不知怎地就被叫做普鲁东。政教系的老师学问大，把我们弄得丈二和尚。打倒新思潮，我的朋友郑艳芬（金猴）受到不公正待遇。她的同伴对她落井下石。相信她不会热衷于校庆系庆班级聚会。可是你自己当初砸烂校级机关，造北京新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不也是无“政府”主义吗？郑君究竟有什么弥天大罪，犯了天条吗？她说国家干部也有剥削。可是1975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评资产阶级法权，张春桥鼓动批判按劳付酬、商品市场经济，打掉土围子，毛泽东批评干部级别制度。这位朋友究竟有何错误呢。这思考的一代，勤奋的一代，不该承担任何责任。不过从今天来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起义，起初的确是砸烂资产阶级公检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就有些儿无“政府”主义，目无旧政府。“新文革”的与“旧政府”的矛盾，一点儿也不是谣言。那个和国务院对立的新文革派，就与总理的内阁政府格格不入。我这里没有纠缠于历史。我只是决然要厘清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来观念。如此而已。我不赞成在观念争持中把他人打入地牢。

已故杨小凯（原名杨曦光）是一个极有思想有个性有棱角的青年。1967年，他写了《中国向何处去》（湖南战马嘶鸣）的传单，剑指官僚特权阶层。他主张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结果他被康生定为“反革命”。康生说，《中国向何处去》是“反革命的战马悲鸣”。“我有一个感觉，他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康生经常凭感觉发现叛徒特务。“要抓后台。他是杨第甫的儿子，我在1959年就注意到杨第甫了。”先知先觉！抓后台，这是国人思维，因为幕后之人深知幕后秘密。思想自由，个人为自己的思想负责，就不会有寻找后台的念想。杨曦光的母亲陈素被逼自杀。《中国向何处去》是用无政府主义思想批判僵化体制，与李文博遥相呼应。不过文革的初衷未尝不是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横扫一切打倒一切荡涤一切污浊，内在于这场运动。

说到无政府主义，乃知人始祖原本处在三无状态，取缔政府原也是先贤们对未来的某种美好设计。人类对未来的憧憬与希冀，幻化为种种文字，于是就有了白日梦与乌托邦。白日梦是发明创造的原始发条和扳机。但 daydreams 可一点儿也不带贬义。无政府主义也并非恶谥。然而桃花源君子国上古之世三代之英天下为公的怀旧以及八仙过海之类，与对未来的向往期盼却毫无瓜葛。无政府之“巴”“金”主义原也不失为积极进取之尝试，不可恣意贬低诋毁。当然，说公社不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就真的有些许弱化政府职能况味。当初豪杰蜂起，共产主义运动无政府主义并峙，巴黎公社真的就废除旧衙门政府，处于群龙自治状态。李文博等良民被目为无政府，事出有因。不过中央文革卵翼下的北师大井冈山自身（They, themselves）又何尝不真的目无国法目无国府呢？连国家元首统领都督都打倒了，何政府之有耶？

在马克思看来，对社会而言，国家是寄生虫。我这篇文章不是赞成打碎国家机器，只是论述马恩的一个学理。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苍天在上：这决然不是我的创造。马克思说，国家是社会机体上的赘瘤。他把掌控国家权力的官僚机构称为国家寄生虫。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铲除官僚体制，就是扫除国家寄生虫。

1891年3月18日，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说，国家是一个祸害。因此，无产阶级一旦获得政权，第一步就是立即铲除这个祸害，即消灭作为国家的国家，建立没有官僚制度的无产阶级自己的共和国。“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3〕只要还是作为一种国家存在着，它就一直是一个祸害。简言之，国家是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不过巴黎公社也好，马克思主义也好，都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的产物，嫁接在落后的小农经济的树枝上就得重新思量。你如果废除国家，可能就废除了社会本身。

如何消除这个祸害呢？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一旦获得统治权，第一步就是“同公社一样”，立即除去国家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全部国家废除。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它被称为新的国家。新的国家也是一种国家，它仍然是祸害。对于这种国家，就应当防止它由“新的”返回到“原来意义”、即防止它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防止它滥用权力为非作恶。恩格斯说国家是一个祸害，不仅是指旧的国家，也包括新的国家。因为正是毛泽东说，否则，那就不要多久，马列主义的党就会变成法西斯党。

恩格斯说：巴黎公社是“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4〕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作为自己解放的政治工具。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乃是“国家自身”。马克思指出：“历次的反动和革命所起的作用只是把这一组织起来的权力——组织起来奴役劳动的暴力——从这一手中转到另一手中……这次革命的对象不是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而是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怪胎。”无产阶级民主与消灭官僚体制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同公社一样”，立即除去国家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就不仅抹杀了新旧两种革命的界限，而且抹杀了新旧两种国家的界限。

《共产党宣言》说：“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这可能就是北师大新思潮所要表达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新的国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统治和压迫的工具。它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国家是令人厌恶的。阶级统治是受排斥的。他们的理想是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的国家。巴黎公社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提供的最有借鉴意义的是“普选制”和“低薪制”（最近据说公务官员实行低薪制，我翘首以待）。

抗战初期，国民党提出“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爱国御敌”，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提出：“现在谈爱国，那是爱谁的国？蒋介石的国吧？”蒋介石发表抗日讲话，号召人不分老少，地不分南北，大家一致抗日爱国，但毛泽东说：“少数人的国，他们少数人去爱吧。”“一个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有什么脸面代表这个国家？爱这样的国家，就是对祖国的背叛。”〔5〕毛泽东说：“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这样的共产党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挂着羊头卖狗肉，那么人民就要自发组织起来，以武装的革命坚决打倒假共产党！推翻其在中国的罪恶统治！并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一切附着在这个奸伪集团上的官僚买办汉奸势力！”〔6〕

毛泽东认为商品制度和工资制有利于资本主义，还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12月26日，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毛泽东一直认为，商品经济、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与资本主义有密切联系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他把商品经济与“变修正主义”、“产生资产阶级”联系起来，与“林彪一类上台”的忧虑联系起来。这大概符合马克思主义。

据说马克思说，“早晚有一天人们会用黄金去盖厕所”。他是说在共产主义，黄金将只作为普通金属材料存在，不会受人追捧。列宁云：“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将用黄金盖一个厕所”，以表示对货币及黄金的鄙视。不过目今贪官们还是贪婪无厌于黄色金属。

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由林彪集团联系到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说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认为资产阶级法权“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其结果，就是“在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少数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如果这样，文革北师大当权组织就不应该那样凌辱自己的同伴。

美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学研究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认为，对巴黎公社的特殊兴趣，是毛泽东思想与行动中富有神秘色彩的特征之一。他还认为，毛泽东继承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并论述了巴黎公社同“文革”有一定关系。巴黎公社对最初的中国共产党人产生过启蒙作用。毛泽东所推行的人民公社 是对巴黎公社的模仿和赞许。

在迈向国家消亡的道途上，巴黎公社是座丰碑，巴黎公社弱化而非强化国家镇压职能，你可以说这是公社失败的缘由之一，但你得承认这是公社的原则，它取名公社而非国家，它叫巴黎公社，分明是城市共同体，类似于史前的前国家形态的社会组织。务必记住，公社的概念源于原始氏族社会公有制经济共同体，那时还没有阶级划分、国家对垒、战争机器、军队法庭。巴黎公社和上海公社是姊妹篇。然而1958共产风回归农村原始公社，甚至有人设想公妻共食共宿取消货币，这些空想乌托邦和巴黎公社大异其趣。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因为要回归无阶级无国家无战争的三无世界，都是美好设想；要在打碎国家机器，并非强化或代之以新专制机器。如果那样，换汤不换药，则是走一甲子一轮回老路。那便不是革命，而乃城头变换大王旗的走马灯，你方唱罢我登台，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原来意义上的国家风水轮流转，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恩格斯说：巴黎公社是“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之所以说“新”，是因为它除去了国家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即消灭了官僚制度，从而消灭了国家等级制，扫除了国家寄生虫。依赖他人为生已成既往。社会公职由“一些人”的独占成为社会公共占有，公权私化成为陈迹。为了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公职人员不仅依靠选举产生，而且可以由选民随时撤换，公职人员只拿相当于工人的工资。新的官吏是人民意志的代言人，是公仆——时下改称公务员。生产者是唯一的统治者。国家权力固定在“一些人”的手里，使当官成为一种“热门”的职业，千军万马疯考公务员，这种现象不复存在。升官不是发财之路。加官进爵不再。

马克思恩格斯说，“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打碎和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它。“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英勇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打碎官僚军事国家机器”，表明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对待国家一般的基本态度。

“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面。”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7]。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

马克思恩格斯详尽地论证巴黎公社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是“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是“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公社不是压迫性的机关，而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府；公社的领导成员不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而是由人民选出，受人民监督，并废除了一切特权的“人民的勤务员”、“公务员”、“公仆”；公社不是官僚腐败机构，不是吸血鬼，它取消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官吏高薪，是“廉价政府”；公社对农民决不去“敲骨吸髓地压榨”，“决不靠农民劳动以自肥”，而要免除他们的一切血税，要给农民直接带来重大益处。

巴黎公社规定一切公职人员的工资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是人民群众监督并可随时罢免公职人员。恩格斯认为，这些措施，就能可靠地“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联想现如今的高薪阶层，这是最吸引眼球的。高薪养廉，实际是高薪养贪养痍遗患。这太无情。

我绝非赞成文革时期疾风暴雨般的消除腐败。有人乐意欢呼把贪官拉出去枪毙。我却更赞成消除产生腐败的土壤。我不赞成回归巴黎公社，但我赞成巴黎公社的原则。我也钦敬那些思考的一代——尽管幼稚。我认为说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因为聪明的人类人类的确按照公社的原则学会报关员放在龙阻力对权力加以约束。巴黎公社的故乡法国，官员的腐败得以遏制，得益于巴黎工人的首创精神。

为何呼为巴黎公社而不叫“法国”“法兰西”“高卢”公社？因为这是城市共和国。希腊城邦在原理上就不同于乡间城堡式的壁垒。同样，公社也是商品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按当时共产主义者们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幼稚想法，工人没有祖国，他们的事业和创举美其名曰“英特那雄纳尔，international，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正当称呼是国际共产主义，共产党是国际组织的支部（Branch，肢体，不是母体）。响彻云霄气贯长虹的是“起来，全世界……们”“我们要做‘天下的’的主人”，“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让思想冲破牢笼”。怀乡还土的桑梓概念不强烈。共产主义同传统观念决裂，就包括决绝于母国观念和私有制观念（当时公有制观念亦非所谓国家公有，而乃天下为公。十月革命也是调转枪口攻打冬宫，战场哗变，前线倒戈，变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民族私利弃于一旦）。

公社非原来意义之国家，即指，公社非（传统）国家！公社非雄踞于世界环伺覬覦之列强列邦。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首创精神和自我牺牲的勇气，毅然切断天然纽带和笼罩家庭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没有儿女情长，没有怀乡思亲的柔情蜜意，没有乡土情结，没有血缘地域屏障，没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难怪责难者说：你们要消灭祖国，马克思断然回答：工人无祖国，到处是祖国，四海为家，天南地北，云游八极，包举宇内）。

我这里一丁点儿也不是回归巴黎公社，我只是就事论事，推理演绎，抬杠咬理！

注释：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77页。
-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411，413页和437页。
-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页。
-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页。
- 5、《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1944年6月13日《解放日报》。载1946年大连大众书店出版的《毛选》。
- 6、1946年大连大众书店出版《毛选》第二卷，第275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55—359页。

☐ 原载《爱思想》网站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华夏文摘》网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 <a href="mailto:tougao@cnd.org">tougao@cnd.org</a> 其它事项请电邮：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

---